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美] 马克·里拉 罗纳德·德沃金 罗伯特·西尔维斯 编
刘擎 殷莹 译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马克·里拉
[美] 罗纳德·德沃金 编
罗伯特·西尔维斯

刘擎 殷莹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以赛亚·柏林的遗产 / (美) 里拉, (美) 德沃金, (美) 西尔维斯编;
刘擎, 殷莹译.—2版.—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225-755-9

I. 以… II. ①里…②德…③西…④刘…⑤殷… III. 伯林, I (1909~1997)—
自由主义—思想评论 IV. D095.615.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数字 (2009) 第159975号

以赛亚·柏林的遗产

(美)马克·里拉 罗纳德·德沃金 罗伯特·西尔维斯 编

刘 擎 殷 莹 译

责任编辑: 吴 超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seekmore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970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3.5千字

版 次: 2009年9月第二版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55-9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编者与作者简介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法学 Quain 讲座教授, 纽约大学法学与哲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Life's Dominion* 和 *Freedom's law: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Constitution* 等。

艾琳·凯利(Aileen Kelly):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著有 *Toward Another Shore: 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 和 *Views from the Other Shore: Essays on Herzen, Chekhov, and Bakhtin* 等。

马克·里拉(Mark Lilla): 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他是 *G. B. Vico: The Making of an Anti-Modern* 的作者和 *New French Thought: Political Philosophy* 的编者。

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 锡耶纳大学道德哲学教授,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和 *The Curious Enlightenment of Professor Caritat: A Comedy of Ideas* 等。

阿维赛·玛格里特 (Avishai Margalit)：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最新著作有 *The Decent Society* 和 *Views in Review: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State of the Jews*。

托马斯·内格尔 (Thomas Nagel)：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The View from Nowhere* 和 *The Last Word* 等。

罗伯特·西尔维斯 (Robert Silvers)：《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主编之一。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麦吉尔大学政治学和哲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Hegel* 和 *Sources of the Self* 等。

迈克尔·沃尔泽 (Michael Walzer)：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异议》(*Dissent*) 的主编之一。他的著作包括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和 *On Toleration* 等。

伯纳德·威廉姆斯 (Bernard William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哲学 Deutsch 讲座教授，牛津大学众灵学院研究员。他的著作包括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和 *Shame and Necessity* 等。^①

理查德·魏赫姆 (Richard Wollheim)：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哲学系主任。他的著作包括 *Painting as an Art* 和 *On the Emotions* 等。^②

① 伯纳德·威廉姆斯教授于 2003 年 6 月 10 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② 理查德·魏赫姆教授于 2003 年 11 月 4 日去世，享年八十岁。

导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于一九九七年辞世,享年八十八岁,这让他的友人与读者感到巨大的损失。伯林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将他在阅读他所赞赏的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政治家的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兴奋来激发别人,尽管他对那些作品的赞赏从不是纯粹的。在论及思想史的生动作品以及对人物生平的勾勒中,以赛亚·伯林本能性地在他自己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保持着批评性的距离。这种本能对他和他的研究对象同样有益。通过发现和揭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中或一个作者的生活中存在的矛盾,通过指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远见如何被一些盲点所遮蔽以及被无意识的局限所制约,伯林得以展现他在道德上与政治上为之辩护的多元主义是如何深入地根植于人类经验之中。他以这种方式赋予了他所珍爱的东西更多的价值。

一九九八年秋,纽约人文研究院主办了一个纪念伯林逝世周年的会议。此前,牛津、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已经举办过各种悼念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意在赞美伯林的个人品质——他的热忱、他的智慧、他对音乐的钟爱、他对闲谈的热心以及他的谈话天才。我们相信,一个不同类型的

纪念活动——集中讨论他的思想遗产,并以他会赞赏的方式,向公开的审视与批评开放——也会是合适的。因此,人文研究院邀请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著作颇有研究的学者和作家汇集纽约,展开为期两天的研讨与辩论。这是一次愉快而令人兴奋的活动。起初,我们并没有发表论文集的计划。学术会议大多是昙花一现的事件,很快就会让人失去兴趣。但是以下几种考虑说服我们改变了想法:提交给会议的论文的质量,它们所激发的辩论的强度,列席会议的听众的数量之多,以及我们所收到的索取会议记录的众多请求(特别是在关于会议的一篇文章在《纽约时报》刊出之后)。这部文集的发表受惠于丹尼尔·罗斯与乔安娜·罗斯(Daniel and Joanna S. Rose)的赞助以及洛蕾塔·兰迪·索伦森(Loretta Landi Sorensen)在编辑方面的协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纽约学术会议的不同部分都涉及了多元主义的各种方面——道德的、意识形态的、伦理的和文化的。对多元主义的承认与宽容被伯林看作是自由主义价值的精髓所在,而且他相信,他对多元主义的分析是他对道德与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而他那些哲学性较强的研究,也是通过这个思想线索,与他另一些性质不同的对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的探索形成了联系。这部文集起始于探讨伯林的多元主义如何萌生于他在思想史中所发现的“刺猬与狐狸”之间的差别——“刺猬”建立了关于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性理论;“狐狸”则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多样性,而畏惧那种甘愿把人类尊严牺牲于一个理念祭坛上的狂热分子。伯林用这种分类来区别与对比现代思想的两大潮流,一种来自德国与法国的启蒙运动,另一种出自更少为人理解的源头——他称之为“反启蒙运动”,这个术语也因为他的使用而变得流行。艾琳·凯利、马克·里拉和史蒂文·卢克斯对这两种思想潮流的特征以及它们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表达了不同的见解。

第二组论文考察评价了伯林具有影响的哲学论断：客观上有效的（的确是吸引人的）人类价值必然相互冲突，所以满足一种价值必然意味着牺牲另外一些价值，而这个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一论断，它是合理的吗？这恰恰涉及到，比如，在自由与平等这两个观念中，一个理想只有在牺牲另一个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吗？或者，伯林所辨识的这两个理想之间表面上的冲突仅仅反映了对于如何理解和贯彻它们的一种误解和不确定性吗？如果自由主义的各种核心价值之间的确互相冲突，那么我们能以此推论自由主义必定失败吗？或者这仅仅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谨慎地避免那些过度和不现实的方案吗？这些是罗纳德·德沃金、伯纳德·威廉姆斯、托马斯·内格尔和查尔斯·泰勒等人提交的论文所针对的主题，也是在论文报告之后他们之间热烈辩论的话题。

第三组论文致力于讨论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和以色列国的语境中。正如像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新近出版的优秀传记作品《以赛亚·伯林的一生》（*Isaiah Berlin: A Life*）中所显示的那样，伯林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专注思考与他对二十世纪以色列和犹太人命运的热烈关切是紧密相连的。虽然在伯林的其他作品中，他强调各种价值之间的多元性冲突以及种种被迫的妥协，但在这个主题上他却坚持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现代民族主义的现实或许可以和谐相容，前者之中养成的那种“正派感”（the sense of decency）可能会在后者所提供的归属感中找到根源。罗伯特·西尔维斯、阿维赛·玛格里特、理查德·魏赫姆和迈克尔·沃尔泽在此讨论了“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原则以及作为实践性的政治目标——的内在一致性。

纽约会议所讨论的这些主题当然没有，也并不想要穷尽以赛亚·伯林作品惊人的丰富性。许多他最为重要的思想论题——浪漫主义、政治家以及俄国文学等——都没有被纳入这次会议的讨论之中，但我们期望这部文

集将会引发更多的同道,继续致力于对以赛亚·伯林非凡思想成就的全面研究。

马克·里拉

罗纳德·德沃金

罗伯特·西尔维斯

目录

1 导言

第一部分 刺猬与狐狸

3 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 / 艾琳·凯利

24 狼与羊 / 马克·里拉

33 一个过时的狐狸 / 史蒂文·卢克斯

45 讨论：刺猬与狐狸

第二部分 多元主义

55 自由的各种价值冲突吗？ / 罗纳德·德沃金

69 自由主义与损失 / 伯纳德·威廉姆斯

78 多元主义与一致性 / 托马斯·内格尔

83 善的多元性 / 查尔斯·泰勒

89 讨论：多元主义

第三部分 民族主义与以色列

- 107 引言 / 罗伯特·西尔维斯
- 109 民族主义的“曲木” / 阿维赛·玛格里特
- 119 伯林和犹太复国主义 / 理查德·魏赫姆
- 125 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改良 / 迈克尔·沃尔泽
- 131 讨论: 民族主义与以色列

- 149 译后记

第一部分

刺猬与狐狸

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

艾琳·凯利

“……关于差异性中统一的观念,况且还有统一性之中各种差异的观念,这种‘一’与‘多’之间的紧张,是他所痴迷的主导观念(*idée maitresse*)。”

——以赛亚·伯林《赫尔德与启蒙运动》^①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的,“我们都宣称主张自由,但在使用这同一个语词的时候,我们并不总是指称同一个事物”。^② 以赛亚·伯林一生的作品都是在阐明与辨析这个概念的多种含义,而他的方法经常是用未确定的角度来探寻既定的信念。因此,他的思想遗产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于他称之为“文明当中重要的却也常常是令人不安的不法之士”的洞察,这些思想的独行客,自十八世纪以降猛烈地侵入了清醒而理性的“欧洲思想家们组成的秩序良好的队伍”。^③

① Isaiah Berlin, *Vico and Herder* (The Viking Press, 1976), pp.153 - 154.

② Roy P. Basler, edito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3), Vol. VII, p.301.

③ Isaiah Berlin, *The Magus of the North: J. G. Ha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Irrationalism*, edited by Henry Hardy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p.xvi.

伯林本人常常被他的评论者看做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对于一元论者和多元论者、刺猬与狐狸所做的重要的二分法,被阐释为一种对启蒙价值的竭力攻击,这种攻击是出自对其更为怪异的手的对手的怀有敌意的和歪曲性的看法。已有论者指出,针对根植于启蒙思想的历史目的论所导致的专制结果,他的反应使他倾向于太过紧密地认同维柯(Vico)、赫尔德(Herder)和哈曼(Hamann)所表现出来的反启蒙。他对这些不法之士的同情使得他对他们的非理性主义与他自己的多元自由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视而不见。^①

伯林对这类批评是了然于心的,这体现在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对那些“令人惊异的意见”所做的评论中,这些意见自从十年前他关于两种自由的演讲发表以后就加之于他了。在这个演讲中,伯林反对那种将自由与宏大目标相联的目的论学说的扩张,而为消极自由作出了辩护。他说,他一直被指控为过度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极端相对主义以及一揽子地肯认与积极自由相对立的消极自由。但他申辩说,他并非此意,“因为这本身恰恰会造就一种不宽容的一元论,而这正是他的整个论述予以反对的”。^② 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伯林的评论者认真探讨过他的整个论述,大多集中于讨论特定的领域,而采用的方法曲解了整体的图景。例如,人们对伯林关于一元论者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历史冲突的观点的讨论,常常是依据他对启蒙运动的三个主要敌手的研究,而不提及一个异类的、也更大的思想家群体——俄国知识界,他们在伯林对自由问题的反思中处于中心地位。

在《理想的追求》一文中,伯林追述了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和理论家们的道德方法——他们关注人类非正义状况的根源以及人性关系中的虚假

① 例如,参见 Mark Lilla, "The Trouble with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6, 1994。

② Isaiah Berlin, Introductio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xiv, ivi-ii, n. 1.

性——对他思想最初的影响。他写道,这些俄国思想家使他强烈地意识到,二十世纪巨大的意识形态风暴不只是客观力量冲突的结果:它们“始于人们头脑中的理念:关于人与人之间已有的、现有的、可能会有的以及应当具有的关系的理念”。^① 因此,他相信,为了理解我们这个危险的世界,并能够在这个世界中合理地行动,极为紧迫的是我们要检讨分析我们所具有的每一种思想资源,其源起、发展、本质,以及——最为重要的——其目标的正确性和指引人类行为的动机。

像伯林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的那样,他把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投身于这项伦理性的研究。是这些俄国思想家首先激发了他,去重视另一些感知世界的方式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结果,但他对这些俄国思想家的研究所受到的关注却如此之少,这令人感到奇怪。第一部讨论伯林自由主义的专著仅仅提到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列宁,^②而约翰·格雷(John Gray)在他论述伯林思想的专著中,决定不讨论他的研究对象“对俄国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似乎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观点,那就是,伯林对于俄国问题的论述文章虽然有意义,但只是代表了他在一个领域中的个人兴趣,对他主要的思想事业而言是处于边缘的。^③

但恰恰相反,这些论述文章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伯林思想具有核心意义。第一,它们赋予了伯林讨论刺猬与狐狸的一种方式,一种避免了简约化危险的方式。他所关注的俄国思想家广泛地受到极为多样的欧洲思想与运动的影响,包括启蒙理想主义、反启蒙神秘主义、浪漫派个人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又分享着一种独一无二

① Isaiah Berlin, "The Pursuit of the Ideal",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edited by Henry Hardy (Knopf, 1991), p.1.

② C. J. Galipeau, *Isaiah Berlin's Liber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③ John Gray, *Berlin* (London: Fontana, 1995), p.2.

的担当,致力于那些作为完整世界观的理念,一旦被采纳,就必须在私人 and 公共行动中付诸实践。因而,他们的价值在于,为伯林提供了具体例证的丰富源泉,来讨论一元论与多元论在对待历史和人类生活方式中所具有的动机和结果。

第二,伯林对俄国首要的狐狸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的赞赏极为突出,在他对西方思想家的评价中无一可与赫尔岑相提并论,这有助于解答那个被认为是关于伯林自己思想的最富争议的问题:特别是他的见解的一致性,以及他的多元主义与他的自由主义的关系。伯林论及道德和政治理论的主要著作与他讨论俄国问题的文章之间的内在关系反映在它们平行的著述年谱中。确立了伯林多元主义精髓的几篇主要文章发表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之间(继而结成题为《自由四论》的文集);而在他论述俄国思想家的十篇论文中有九篇首度发表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之间(唯一的例外是他晚期对屠格涅夫的研究)。他批判历史目的论思维的长文《历史的必然性》写在一九五三年,也正是在同一年,他发表了《刺猬与狐狸》,描述了托尔斯泰的怀疑论现实主义与其所追求的普世性解释原则之间的冲突。^①

① 后来被收编于 *Four Essays on Liberty* 的论文是“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49),“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于1953年的一次演讲中发表并于翌年出版),“Two Concepts of Liberty”(1958)和“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Ends of Life”(1959)。被收编于 *Russian Thinkers*, 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Aileen Kell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8)的伯林论及俄国主题的文章有:“Russian and 1848”(1948),“The Hedgehog and the Fox”(1953),“A Remarkable Decade”(于1954年在四次演讲中发表并于1955至1956年出版),“Herzen 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1955),“Russian Populism”(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1960]一书的序言),“Tolstoy and Enlightenment”(于1960年的一次演讲中发表并于翌年出版)和一篇关于屠格涅夫的文章“Fathers and Children”(于1970年的一次演讲中发表并于1972年出版)。

此外,他为赫尔岑的 *From the Other Shore* 与 *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1956)的英译本,以及赫尔岑论文集 *My Past and Though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8)的译本分别作了序言。

对俄国主题的短文,包括广播讲话和向 *Foreign Affairs* 杂志的投稿,都在 *Russian Thinkers* 的编者所作的序言之中被列出。